



江油李白



| 李白的家世及其父亲李客

一、李白的祖族与家世

关于李白的祖族和家世问题，说法颇多。一说是李暹之后，主要源自李白自己的说法，他的从叔（一说族叔）李阳冰也给予了相应的证实。再就是李贤、李穆之后，李抗之后，李建成之后，李瑗之后，李轨之后，李伦之后，这些都是后世学者根据李白诗文里的“蛛丝马迹”、历史事件、民间轶事推断而来。从学术研究讲，众说纷纭体现了学术争鸣的盛况，亦是“李白热”在千年以后的今天进一步增温暴热所致。还有混血说（异族说），说李白是汉之苗裔，胡之身躯。所持依据是，李唐王朝的《宗室世系表》没有将李白身世纳入“世系”。依李白所言，他的祖上与唐朝王室血脉同宗。天宝元年（742），供奉李唐皇室祖先的宗正寺里没有将李白家系列入诏赦对象。以此看，李白的血脉承袭就与李暹无关。另外，李白对李唐宗室的称呼混乱，让人“不知所措”、难知究竟。至于说李白貌似异族，依据是魏颢对其外貌的有限描写；再有就是说李白懂“外国语”，源于“醉草蛮书”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如此以民间传说为依据，也是不靠谱的。

有关李白的祖族脉系，可靠的史料极少，说法颇多，一千多年了仍无定论，自在情理之中。

二、李白之父李客

首先看李白的父亲。有人推测，李白的父亲李客可能存在三种身份：一是商人，家底殷实，即李白出生在富商之家；二是侠客，懂剑术，武功高强，属藏龙卧虎，即李白出生在侠客之家；三是文人，有文化，有学养，一直过着闲居云林、韬光养晦、深居僻壤的日子，即李白出生在隐居乡野的书香门第之家。

是否如此，得从其祖族说起。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李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暹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首先要判断这段话所给出信息的真实性。其可信度当十之八九。原因在于：

其一，李阳冰是李白的从叔，有无血缘暂且不论，至少是个同姓本家。关系的亲疏程度，只有他俩知道，同样影响着这段史料的可信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李白在生命最后时刻去投

奔他，也不妨碍李白向其道出家世真相——因为，李白“又疾殒”，再次得了重病，自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再无他人值得信赖、可以托付。所以“枕上授简，俾余为序”。也就是说，李白是躺在病榻上把诗稿亲自交到从叔李阳冰手里，恳请李阳冰为其编辑诗集并作此序。所谓“枕上授简，俾余为序”，其实就相当于李白的“临终遗言”。既是“临终遗言”，则“序”中所述，可信度很大。

其二，李阳冰接受了为李白编印诗集并作序的请托。按惯例，古人在为别人的诗文集作序时，对作者的身世需做必要的说明以存告后世。又尤其是眼前的请托者当时就名震四海，即将辞别人世，理当“其言也善”。对此，李阳冰更是态度审慎，力避虚妄。鉴于此，诗集的作者本人也有义务当面交代清楚或者述诸以文。再说，依“序”所言，历时百余年，李白家族的一切“敌对”势力也早该淡化了这一段水火难容的“孽缘”记忆（假设真有“孽缘”）。在这种情况下，李白可能会有所保留地道出家世“真相”。所谓“有所保留”，就是隐其“要害”，显其“皮毛”。就李白的身世及其经历来看，他对自己的身世也可能仅知大概，难知细节。

其三，李阳冰与李白的交流也非一天两天，既是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大家，著名的文化人，还是堂堂县令，又是其“从叔”，来担任李白诗歌集的编辑者，李阳冰一般会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在其序文中对李白的身世予以客观陈述。即所述之事虽不够具体清晰，甚至会人为地“遮蔽”一些事实真相，有意让人有“含糊其辞”之感，但所述内容却真实可信，只是隔着一层人为的“烟瘴”，让人“不明就里”，生欲穷其本源的愿望。这也是“李白热”难以降温的重要原因。

三、李白的家世自述

李白自称是“凉武昭王暠九世孙”。武昭王李暠生于351年，卒于417年，距李白降生的701年，过去了300多年时光。李白家的血脉是否传承于此，在无家世牒谱、又无别的史料佐证的情况下，的确难以考据。如果按20年一代人的话，这个家族到李白这里至少经历了20多代人。代代繁衍，迁徙辗转，中间的变故之大，确难查实。

李白的先祖“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是否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是李轨（？—619年）之后呢？李轨兵败于李唐王朝的开创者李渊，其后人为避“斩草除根”之祸而不得不远涉异域，隐姓埋名，苦熬近百年艰难岁月亦在情理之中。李白若是李轨之后，从时间上看，灭门之祸已过去80多年。这时，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对李白家而言，可以说是“祸端已远”。至少，失去江山的李唐后人无暇顾及先辈的世仇。在此时，李白父亲选择举家返回中土，从时间与情理二者兼顾来看，这是可能的。

李轨是李暠之后，但是，李白是否确是李轨之后，这中间缺乏事实上的衔接依据。

李白若是梁武昭王李暠之后，又未被收入李唐皇室族谱，可能有如下原因：

其一，李白家族是李暠之后的其中一支，如范传正所言的“一房”，但又与李唐皇室这一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故而李白祖上被迫流寓西域，要隐姓埋名，延续血脉，以待时机。时间即使推移到李白这里，也难“旧事重提”，犹恐避之不及。

其二，还有可能是，李白祖上这一支有世人共诛的“污点”，有辱李唐世族的清誉，不

李唐皇室这一支认可，难以继续立足中土，而不得不流徙西域。以致事过百年，也难以从李唐皇室的记忆中轻易“抹去”。李白自知难以得到现在的李唐皇室的“谅解”，故未申报，使其家系最终未入李唐皇室宗祠。

其三，“非罪”或为非常之罪，还可理解为横来之罪，强加之罪，大有飞来横祸之嫌。来势之强，无力相抗，同样是灭门之患，不得已选择暂时回避，暂时远遁。

其四，“非罪”一语也可能是借口，实情不便与外人道。或者李白本人根本就不知道真相，所以只得无奈地假托为“非罪”。

总之，原因特殊，其祖上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寓”异域，落得个“易姓与名……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的家族悲剧。从此句看，李家祖上因“非罪”而迁寓西域，也不过百年时光，让人隐约感知到，“威胁”依然潜在。李家的后人还得一切都需小心从事，也就不难理解李白内心的隐忧了。

可见，李白祖上的“问题”一直是李白的心头之痛。尽管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已接近李唐一系主脉。但是，他始终不敢直接对李唐王朝或者世人说出深埋内心的秘密，直到即将离世之时，才不得不“有所保留”地告知从叔，留下这仍然“谜”一样的“线索”。

四、李白之父迁徙蜀中

“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二首》其一）这是李白的诗句。其祖上“五世”寓居异乡，按20年一代计，正好100年。百年岁月，流寓西域，但他们一直心系中土，时刻准备着有朝一日能踏上返乡之途。他们一直都怀揣着振兴家族的“荣亲”梦。这个梦想是以振兴家族为主旨，为终极目标，是否了却祖上的恩怨情仇，洗刷冤屈，铲除异己，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光明正大地行走于中土大地，能否重现家族昔日的荣光。于是，一代代李家人卧薪尝胆，殚精竭虑，积储能量，等待机会，并将这个梦想一代代传下去，一旦时机成熟，便相时而动。所以，才有了李白之父李客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也才能担当李白的启蒙老师。李白也才有条件那么早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启蒙教育，而且效果惊人。在李白年少之时，也才可能让其专心致志地离家求学，练剑习武，拜师访道。

因为此前没有“回迁中土”、重见阳光、兴复家室的机会，李白其父或者上几辈人，他们只得“流寓”西域，或“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但他们会一如既往地把“振兴家族”的种子根深蒂固地种植在李家下一代人的灵魂，代代相继，累世不辍。在李白出世前夕，机会终于来临——690年，武则天窃取了李唐江山，李唐王朝的后辈们已无暇顾及曾与之敌、远居西域的这一支。武则天登基，客观上为李白“振兴家族”、实现“荣亲”梦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在此情况下，才有了其父李客的举家回归，才有了李白在蜀中江油的勤学苦练，拜师求艺，完成“振兴家族”的一切前期准备。

这个假定是以李白祖上确是陇西李氏家族后裔这个说法真实可信为前提的。换言之，即便李白家世不是这样，而另有不便公之于众的隐情，从隋末至此也有上百年的历史，李白一家也经历了五代以上流居异域的磨难，之前的仇怨也随了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消解殆尽。选择此时千里跋涉，举家回归中土，也算得上是把准了时机。

再就是，他们选择江油青莲这个地方落脚定居，可谓深思熟虑。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

“忌惮”的。从地理位置看，江油可进、可退、可隐，是李客一家事先经过了精心考量最终才选择了这里。可进，只要翻越秦岭，就帝都西安在望；亦可选择从水路进发，出三峡而踏上万里云程。可退，唐时江油的西边紧邻蛮夷，一旦风吹草动，即可再次向西流徙。可隐，在唐代，江油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西北面的崇山峻岭足可成为安居栖身的屏障。

李白的“荣亲”梦在他的诗文中也多有表达。只是被他众多的诗句遮蔽，或者一再被人们忽视，没有跟李白的家世打通关系，形成“链接”。其复杂而隐秘的家世只得深埋在李白心底，或者藏在他众多的诗里。从李白给魏颢、从叔李阳冰的亲口面授来看，其中也有差异。

李白的身前“粉丝”魏颢也为李白编了诗集，并写了《李翰林集序》。“序”中也对李白的家世做了如下表述：“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在这有限的信息里，李家的“西域之行”被彻底隐去。“乃放行”一语表述极为模糊，这样也合乎常理。是其祖上自身“放浪形骸”，还是被迫流放迁徙？随你去猜想，反正这个说法无损李家声誉。或者说，李白在交代身世时本来就隐去了这一段历史。这里的“放行”，就相当于说他家是个“迁移户”，祖上居于陇西，中间是否到过西域并未明言。较之于李阳冰的叙述，这里的交代就更是“有所保留”。后来才“因家于绵”，迁到蜀中绵州昌隆，即现在的四川江油。身世交代虽过于简单，但居住地域的变化却交代得非常明确。更为关键的是，“身既生蜀”这一事实也叙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也就是说，是在李家客居蜀地后才生养了李白。这一点，魏《序》、李《序》、范《碑》的记述完全一致，均无歧义。所以，关于李白出生地之争，可以休矣。

郭沫若当年得出“碎叶说”其实并无确凿依据，是以个人得失、政治至上为前提而孕育的“奇胎”。明辨是非容易，可是，要在短时间内消除“郭说”的影响，绝非易事。

魏颢虽是李白的狂热“粉丝”，但李白对他仍持保留态度。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能把自己的诗交给魏颢去结集编印，已足够交情。但是，涉及家世私密，尤其关涉到自身安全，肯定不会轻易示人。客观上讲，李阳冰也是“陌生人”，但在李白看来，他是远房亲戚，至少是个本家，可信度更大一些。较之魏颢，在李阳冰面前，李白对自己身世的来龙去脉交代得较为清晰，自在情理之中。

魏颢的“简”是因魏颢毕竟是个“外人”，不便交底。李白也不想就此过早地公开自己的身世，以免招来不测。对李阳冰的“详”，在于李阳冰同为“李”姓，是其从叔，可视为他的远房亲戚或本家，一定程度上会保护他，会替他保守秘密。关键是李白即将离开人世，儿女的现状又不甚明了。他适度地透露一些家世，对其儿女的安危没有太大的威胁，这样做也算时机适宜，把握得度。

稍后，范传正的记述可信度也比较高，其相关信息来自李白的儿子伯禽所提供的“手疏”先世谱牒残纸（由李白的孙女保存）。其中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易名……名之与字。”由“被窜于碎叶”可知，李白祖上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地到了西域。而隋末之乱中，李唐一支的迅猛崛起。“成者王，败者寇”，败者自然要远避祸端，隐姓埋名。而后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就成了流徙异域这一系数代人难以泯灭的家族振兴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白先前所说的是武昭王之后这个说法。可以建立“链接”，但未必就属实。

五、李白家世的可能性

魏颢、李阳冰和范传正有关李白家世的记录详略有异，表述有异。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如下可能性：

其一，李白先祖姓李，是望族之后。隋末，先祖遭遇不测，被迫流寓西域。百年左右的“避祸潜伏”，终于等来迁返中土的机会。但是，李家仍然心有所忌，不敢光明正大地将家世告知天下，所以没有直接回归居住地，也没有直入心之所向、梦之所系的都城长安，而选择了蜀中西北的偏僻山村，“蜗居”于此，秣马厉兵，以待时机。

其二，李白诞生蜀中这个事实属实，只是出生年号“神龙”有疑。若是“神龙”，就应该是705年。这时，李白已经五岁，与生于蜀中这一事实自相矛盾。清代王琦提出为“神功”之讹，从时间上看比较符合实情。但是，李《序》、范《碑》都说是“神龙”，问题就出来了。有人论证出现此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二：一是武则天当政，改换年号过于频繁，以致让人记不清楚，产生混淆；二是李白述诸从叔李阳冰时，生命垂危，吐词不清，以致出错。现在可以从记忆规律来加以判断，人们对事件的记忆强度远远大于对时间的记忆。也就是，李白生于蜀中情况属实，只是时间记忆有误差而已。这个误差的出现，错在李白本人。本人记忆出错，亦属常情。但是，这与他自己在《为宋中丞自荐表》的说法又“自相矛盾”。也就是说，在李白的记忆里，自己生于蜀中，但出生时间是“神龙”年，所以，前面几个人的记录出现的错误才完全一致。

李白的家世之谜一直是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痛”，也导致了他无法选择最省事的科举之路、成就“事国”之功去实现“荣亲”的家族使命。因而，只能无奈地选择制举。这个选择虽然被冠以“终南捷径”，实则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与科考相比，“举制”成功的概率更小，要付出的代价更大。科考才是最佳的“捷径”，只需凭借自己笔头上的功夫就可以平步青云，进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举制”除了需要自己“超常”的优秀外，还必须借助外力。别人不“给力”，自己再努力，再优秀，都是白费。这个“别人”就是朝中的高官权臣，他们牢牢地把持着“举制”的路径和关隘。

如果李白是李暹的九世孙，从时间上推算也早超过了九代。据有人推测，按辈分，他也应该是唐玄宗的爷爷辈。天宝元年（742），盛唐之盛达到了极致，为彰扬其辉煌显赫的功绩、强势繁茂的世系和宽宏仁德的雅量，唐玄宗颁布诏书，准许李暹之后“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也就是说，可以登记为皇族户口。这时，李白恰好应诏入京，按常理，他应该去登记。但是，李白没有去。李白被任命为“翰林供奉”，时常都很风光地行走在皇帝身边，他完全可以寻找机会直接跟唐玄宗提起入籍之事。但是，在皇帝面前，号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人”李白也选择了沉默。

李白的“沉默”可能有如下原因：一是李白没有传世家谱，因为诏书中明确提出了“入籍”的要求：“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这一点也从范《碑》的记载得到了印证：李白是“绝嗣之家，难求谱牒”。

还有可能是，正如有的论者说的一样，李白的祖先曾经与李唐皇室这一支为争夺江山水

火不容，现在仍然心有忌惮，不便提及。再就是，他即便姓李，也不是李暹之后，他自然不敢随口造次。李白没有提及“入籍”之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李白其实并不姓李。所以，深埋李白内心的痛也绝非不能实现理想而忧愤难排那么简单。他心中郁积的能量越大，他的诗兴才来得越是澎湃无羁，恣肆汪洋。

所以，李白的“内伤”到底有多痛，只有他自己知道，须得他用一生的时光去慢慢地消解，再以酒的灌注去痛，诗的“井喷”泄愤。李白的诗歌之“气”，情感的冲击力，应是由多种因素汇聚而成。

六、李白家世的其他可能性

首都师范大学檀作文先生撰文说李白是隋末甘肃河西地区割据者李轨之后，是否李暹之后？未见有说服力的论证。车延高先生在其《醉眼看李白》一书里，又说李白是“定武之变”李建成之后。若此说成立，即是李暹之后，李白当然属李唐皇室谱系。

公元617年，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次年，李渊为了进攻薛举，派遣使者给李轨送来玺书，称李轨为从弟（注意是“从弟”，难以证明他们之间存在世袭的血缘关系），意在顺利地“收编”李轨，以尽快成就自己的霸业。李轨并不买账，他有自己的打算，想继续拓展自己的帝国版图，圆自己的帝王梦。这年11月占领了河西走廊的五郡之地，改称凉帝，建元安乐，并遣人给唐高祖送去书信，自称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这个“凉”字与李暹有地域关系，有无血缘承袭关系难定）。他虽口中称臣，实则叫板。619年5月，李渊又派人劝李轨归顺，李轨还是不从。李轨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与其兄勾结胡兵发起攻势。结果，李轨很快战败被俘，送往长安与诸弟、诸子一同被斩。

李白是李轨之后如果成立的话，李白身世之谜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了。但仅仅停留在“如果”这个层面，在李客与李轨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材料支撑。这个“如果”也仍是一个假设。若这个“如果”成立，李白及其祖上即便如此，也不敢冒家族灭绝的风险而回归大唐腹地。现在，李白一家回来了，又回到偏僻的西蜀，这个“如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难以判定。只得再寻证据，作待考处理。

车延高先生在《醉眼看李白》一书中说李白是李建成之后。这时，李白家这一支早已势单力薄，再怎么努力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即便现任皇帝心存戒心，也难以对其皇权构成威胁。况且，李白家的最大奢望也仅仅停留在入仕以重光门楣，希望终结流寓、重新坦然行走在阳光下，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醉眼看李白》本属“戏说”一类通俗读物。故，李白是李建成之后亦可当“戏说”视之。是否属实，仍需待考。

若李白不是凉武昭王李暹之后，就给了考证者巨大的想象空间。

李白口口声声说是凉武昭王之后，仅是一个可以放在阳光下的说辞而已。因为，选择这个说法既可以为自己的家世增光添彩，夺人眼球，还可以引得当世的尊重，有助于李白为其家族顺利完成“荣亲”大任。借助外力，实在是不错之举，既可避隐真相，将危险指数降到最低，又可为家族增辉，为颜面添彩，为“荣亲”梦的实现获取更广泛的支持。

若李白不是名门望族之后，李家又经历了近百年迁徙西域、客居异族之苦，就定有其他原因。其家族之忧，亡族之危，以至经过近百年时光都难以消弭，这很可能就是李家自身的

因素。而最大的可能就是——李白出身于侠客世家。在古代，“侠”亦有好坏正邪之分。行“任侠”就是为了铲除天下之不平。反之，则是强盗草寇之类。

这两种“侠”的共同特点是——都要树敌！如果对手太过强大，己方就不得不避其锋芒，退而远之！只有这样，才能远避祸端，保全自身，延续血脉。而公开声称是李暪之后，就是一件可以助其避开险情的最佳“外衣”。

如果是这样，李白的祖上就很可能不姓李。现在姓李，一为掩人耳目，谨慎行事；二为重出江湖，振兴门楣。一旦攀上名门望族，攀上现任王朝这门“皇亲”，对这两点都有好处。

若是这样，李白之父李客选择地偏人稀、可进可退的蜀地江油落脚，实在是苦心经营的妙招。这也体现了一个远避祸端的侠客之后的应有素质和应持的姿态。

| 再探李白家世等问题

一、李白的家世与从业问题

关于李白的家世与先辈从业等问题，据徐文涛、李晓峰在《李白的诗酒人生》一书中的考证，得出了如下结论：

其一，李白的祖籍可能不在甘肃陇西。

其二，李白的先辈也可能不姓李，其父亲的真实姓名自然也不叫李客。

其三，李白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流徙色彩的富商家庭。

这些都是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所做的推论，有一定的道理。

还有人推测，李白的先辈流寓西域，从事丝绸贸易，因而家庭殷实。郭沫若即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持有者。其实，李白的祖上从事丝绸贸易的可能性也很小。这是有线索可寻的。

据与李白有过直接接触的从叔李阳冰、“粉丝”魏颢，以及稍晚一点接触过李白后人的范传正给出的史料看，李白祖上流徙西域是“被迫的”，不是获罪，就是有仇家追杀，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假定此种情况属实，那么，李白的祖上要在蛮荒的西域同内地人交往，而从事丝绸贸易，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于：

首先，怕暴露行迹。如是仇家追杀的话，更要隐匿行踪；如是获罪流放的话，降罪的“组织”也会想办法断其与内地的交往，以防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其次，一个来路不明的汉人家庭，要融入当地胡人集居区十分困难，除开交流沟通不便的因素外，别人还不一定认可你，很难取信于当地人。要与他们做生意，从“胡口”夺食，则是难上加难。虽然当时属于唐朝管辖区域，李家的种种行为必然就要受到监视与限制，最

大可能允许李家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就别说让李家举家集体逃遁，迁回内地，这就更是不太可能。

而最大的可能是，李白的祖上并非与李唐王朝同宗（有其他论证材料支撑，也被很多学者论证），同时也不姓李。他家巨额财富的来源，是其前辈通过非正常手段攫取的。然后长途奔波，到西域寄居数代，再“潜”到蜀地西北当时还相对偏僻的小山村，置舍办地，隐姓埋名，过起了安适富足的小日子。其父“李客”则“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原因也在于此。

还有一种可能，即李白的祖上根本就没有去过西域，“西域说”纯粹是李白的前辈为躲避仇家眼目而有意设置的“迷局”。现在，在西域碎叶城，找不到李白家族的任何遗迹，就连当地的博物馆也没有相关佐证资料，民间也没有相关传说。只是现在，他们才听我们说李白曾出生在那里。当然，一个“戴罪”的汉人家庭“被窜”于此，也难以留下“痕迹”。如此看来，所谓李白出生“西域说”，仅仅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杜撰的说辞，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这里所说的“遗迹”，既包括实物，也包括当地人的“潜意识”。这点可怜的“西域说”信息，李白却在众多的地方公开透露，甚至还有故意渲染的成分。作为一个日夜渴望走上仕途的人，其祖上实质上的“污点”肯定会成为他入仕之路的最大绊脚石。谁愿意推荐或重用一個政历不清、来路不明的人呢？设置“迷局”就成了李白之父乃至其祖上共同且唯一的选择。

这个“迷局”的设置就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避开来自敌人的真正威胁。

二、李客寓居蜀中后的去向

李家“重出江湖”来路不明，去得也蹊跷。

李白只身出蜀后，留在蜀中的家人突然“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去无踪影，世上可能没有这样巧合的事。李家故伎重演，再次为世人设置了新的“迷局”，原因可能是：李白行走于权臣名门，声名显赫，四海皆知，他却久无入仕可能，无法尽快完成振兴家族的重任；天长日久，担心李白口风不牢，不经意间透露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家世之谜，苦苦设置的“迷局”就可能前功尽弃，进而祸及家族，招致灭门之灾。留在蜀中的家人为远离祸端，不得已，再次启动迁徙异地的“应急”措施。

李白在同辈中排行十二，抛去夭折的部分，亦应有兄弟姐妹在。除了李白的妹妹李月圆死在他的家乡江油青莲、葬于此地外，其余人等均去向不明，集体消失。如今，江油青莲这个地方再也无法寻找到李家其他人的墓冢坟茔，或者别的遗迹，连他们的去向也成了谜。试想，连他妹妹的墓都在代代乡人的努力下保留至今，乡人难道不会倾其全力地保护李家其他人的墓地遗迹？事实证明：李白的乡人是非常敬重他的，精心地保护着他相关的古迹，即使毁损消亡了，又会再度新建。同时还口口相传，颂扬着他留在家乡的那些奇闻逸事。而关于其家的踪迹，一千多年来，却始终保持“缄默”的状态，是的确不知李家的去向，还是集体为李家保守秘密？不得而知。而有关李白本人在家乡江油的种种传说，则生动鲜活地流传至今。这就更增添了李白家世的神秘性。

不管李白的家世怎样，都不会动摇他在大唐和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都不会影响后世

0010

对他及其诗歌的喜爱和推崇，都不会影响对李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三、李客的身份与李白入仕

说李白的父亲是一个富商、同时又是一个侠客是有矛盾的。

富商一般有固定的居所，有熟悉、持续的从商赚钱的渠道，一般不会走出他所熟悉的范围。因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经营的生意既有来路，又有销路；所交之人等同样有较稳定可靠的活动圈子。

如果李白的先辈是巨商，他们携“巨款”潜逃于蜀，最大的可能是，有强人觊觎，想掠夺其“巨额财产”。再从对李白的教育来看，其父又是一个文化人，且学问深厚，颇有渊源。如此看来，李白的父亲应该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儒商。

若是一个侠客，又要有“巨额财富”，那就不是真豪杰，而是一个能力强大的“劫匪”！当他“劫”得这笔“巨款”后，便携家带子、隐姓埋名地过起了舒心的小日子。这种可能性亦非常小。从史上著名的侠客看，多有勇有谋，却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除非李客是个特例。

据此推断，李客很可能是个有着万贯家财的儒商，为防身，又略通剑术。其超级豪富的财产引起了劫匪、强人或者同行的“兴趣”，随时可能被要挟、强索豪夺，不得已，携巨款及一大家人潜逃入蜀。

如果是侠客的话，多半独来独往，“千里独行侠”就是他们别在蒙面头巾上的独特标识。

因此，李白父亲最有可能的，就是一位有着巨额财富、安全遭受威胁的商人。一大家人避祸于此，长此下去，定会坐吃山空，也不是长久之计，继续隐姓埋名又对不起祖宗。于是，李客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李白身上，希望他能够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

这就是成功入仕——出人头地，有了显赫的权力、稳定的收入，同时又有坚实的靠山，他们就可以恢复本姓，走进阳光，走进盛唐，继续李家的事业，继续过富有而奢华的生活。

入仕——李白肩负的家族使命，在当时看来，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又因其家世的特殊性：来历不明，没有正式的“合法”的“户籍”，因而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参加科考入仕，来完成这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使命。“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二首》其一）就是他的真实心声。虽非有“百代”之遥，但从他穷其一生的不懈奋斗来看，“荣亲”之心尤为迫切。

以上的讨论仅限于李白的父亲李客，那李客的前辈呢？依然是难以解开的“谜”。

唐朝恰好就为李白这类“身份特殊”“能力特异”的人开辟了另一条晋升之路——举制，即通过朝廷的重臣名望的推荐而登堂入“仕”。想通过这一“终南捷径”一步问鼎权力的最高层，其前提就是——必须要有非凡的才能，为天下人共识。李白青少年时代勤奋学习、终生追梦不止的强大动力便来源于此。他博览群书，研习先贤成功之道、治国之策，刻苦修炼剑道，拜师学纵横之术，学道求仙以博取好名声，以期名震天下，赢得别人的举荐。为此，他不惜忍辱负重、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四处干谒、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写违心诗文；为此，他不惜是非不分、错上了李璘的战船，风烛残年，还强拖着病躯涉远从军……总之，李白所做的一切，都是本着“振兴家族”这一艰巨的家族使命而去的！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李白后来的诗文和行为中找到论证“线索”：

其一，李白从不在诗文中提及蜀中家人，仅以“故乡”“峨眉月”“子规”代之，而有意透露“西域家世”，意在施障眼之法，以迷惑众人视线。即便是思念家乡，也从未表达要重返

故里、亲人团聚的意愿，仅停留在“思”“忆”“望”的层面。即便他在《蜀道难》中提到了“不如早还家”，那也是用以劝慰别人的，是否是自己心声，亦未可知。

其二，李白出蜀后从来没有回过生养他的地方，一则使命未完成，“无颜见江东父老”；二则可能在出蜀前就早有约定，他走后多少年，如果功名无果，其家人可能会再次举家搬迁到更加隐秘的地方——因为李白未能如期完成“使命”，可能还会暴露家世，担心“仇家”来寻。

所以，李白家要自称是西凉武昭王之后，姓李。因为李姓是当朝天子之姓，十分显贵，同样又是武昭王之后，有着高贵的血统，这样就可以与当朝天子攀上亲戚。如此一来，更易于引起别人的重视，为他尽快踏入仕场、实现梦想增添助推力！同时还可以掩人耳目，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所以，李白的父亲李客可能存在三种身份：一是富商，即李白出生在富商之家；二是精通剑术，即李白出生在侠客之家；三是特有文化，即李白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

三者合而为一，李客就成了“高卧云林，不求禄仕”的神秘人。“高卧云林”是为了暂避家族灭绝之危，休养生息，以待时机；“不求禄仕”是因为必须深藏锋芒，确保家族安全。可以推断，李客的“神秘”是有意而为，表面上闲云野鹤，内心的疼痛与深谋远虑暂时还不便示人。

四、李白的难言之痛

李客的难释之痛承袭于李家先辈的难言家世。因为，振兴李氏家族的使命始于这个家族的流徙之日，止于这个家族的振兴计划得以实现之时。

李白之父李客及其前辈，大概都无一例外地有一身文武兼备的好修为，都一刻不停地为振兴家族而不懈努力。只是时间走到李白这里，李家流徙异域百余年，早已淡出了敌方视线。关键还在于武则天窃取了李唐江山，时机已到，李白才成了担当振兴李家使命而切实付诸行动的不二人选。换句话说，李白的祖辈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使命，一直都在为这个使命的实施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他们一边储备能量，一边等待时机。尽管时间漫长（经历了“五世”，也许是个虚指，意在言时间之长），有时甚至还看不到任何希望，仍然一以贯之，从未懈怠。流徙西域的李家子孙只得化悲痛为力量，一代又一代地忍受家世之痛，不断传递着振兴家族的接力棒。所以，李客不仅担当了李白的启蒙老师，还是李白学习的榜样。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复制”的过程——李客把从先辈那里接受教育，有效地“复制”到李白身上，如此代代相因——李白的内心深处也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家世之痛。同他的父亲李客一样，李白只得将家世之痛深埋内心。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像父辈一样，心怀奇志，胸藏丘壑，一旦风云际会，即刻起于蓬蒿，雷霆入世。

若李白的祖上并非“戴罪”之家迁入西域，李客也是一个因遭遇家族威胁而遁于江油青莲“高卧云林”的隐者，遣李白如此高调入世求仕，这是尽快摆脱家族之危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如此，这个不能外道的“家族之痛”一样要深埋于李白内心。

李白一天不能成功入仕，担要职，居高位，李家绝灭之危的“警报”就一天也不会解除，家世之痛就会继续延续。这或许就是李白出蜀不久之后，李家再次集体隐身匿迹的真相。

所以，无论李白的祖上、其父怎样，家世之痛都是李白的难言之痛，都是李白的入世之碍。

| 李白出生江油的多个依据

一、魏颢、李阳冰怎么说

李白究竟出生于何处，魏颢、李阳冰的记述应该最为可信。因为他们与李白生活在同时代，并有过直接的、较长时间的接触。而且，李白还拜托他们为自己的诗歌结集出版并写了序。这二人要完成如此重托，必然要当面向李白讨教其身世等问题——这是“序”这种文体所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李白也不能避而不谈。

从魏颢、李阳冰在诗集序中的记述看，李白出生于江油应是毋庸置疑的事。

李白的“粉丝”魏颢写《李翰林集序》，“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是李白主动要求魏颢将其诗歌编辑成册的，魏颢在其“集序”中免不了要介绍李白身世，即使李白不说，魏颢也会主动询问。还有，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是在“枕上受简，俾余为序”的情况下完成的。李白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他再次让人将其著述编辑成册，这时的要求更为迫切。其从叔李阳冰肯定会问及同样的问题——李白的身世。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白即使可能因避讳而有所保留，他此时的陈述也当最接近真实。

魏颢在“序”中说：

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

别的先搁置不论。说李白“身既生蜀”，就是说李白是在蜀中出生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家于绵”——“绵”，即唐时的绵州，昌隆县是其所辖。这时，李白就降生了。别无歧义。而且，魏颢在写这一段身世时，并非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他在开篇还洋洋洒洒地写了如下一大段文字：

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如此“浪费”笔墨地为李白的降生做铺垫，魏颢用意何为？他说，自盘古开天辟地，西南之地即得天地偏爱，因而地灵人杰，英才辈出。这些英杰一鸣惊人，惊世骇俗。先后有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等一般英才相继出世，文采斐然，著述颇丰，名垂青史。到了唐朝，就有了陈子昂、李白的横空出世。魏颢禁不住由衷而叹：“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皆五百年矣。”西蜀之地钟灵毓秀，蜀中之人得天地钟爱，他们不鸣则已，鸣则惊天地，泣鬼

神。不出五百年，就会有这样的人雷霆出世，名震万方！

从魏颢的这一声惊叹里，我们知道：魏颢非常自然而然地就把李白归入降生在蜀中的“蜀之人”，而且肯定说李白是蜀中“五百年”才诞生的旷世奇才！

再看李阳冰的叙述：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较之魏颢的叙述，更为详尽。关于出生地，说得更加明确：“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时间是“神龙之始”，背景是“逃归于蜀”，然后“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因果关系，事件承袭，一目了然，且与魏颢的叙述完全一致：李家迁入蜀中，李白才出生，姓、名、字的来历交代得十分清楚，就连其降生之“传奇”，也得到了世所共识。

二、范传正怎么说

李白辞世后，他的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这篇文章是在“访公之子孙，将申慰荐。凡三四年，乃获后女二人”的情况下，根据李白子孙提供的“证据”而写下的碑记。关于李白的身世有如下记录：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於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编於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从这段叙述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李白“其先陇西成纪人”，说的是他的祖上氏族的缘起之地。“凉武昭王九代孙”交代的是李白的身世，血脉源头。他的先辈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於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说他的前辈辗转迁徙，直到神龙初，才“潜还广汉”（汉时，设置“三郡”：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唐时昌隆为汉时广汉郡所辖，故有“广汉”之说，实指较大的地理范围），来到蜀中。之后，才“公之生也”，才恢复了“李”姓，才有了他的名与字——名白，字太白。

这段文字对李白的家世承续转徙、来龙去脉、李白的出生地及其姓氏名谁交代得一清二楚，别无歧义。

以上三人的记述，前两人为李白亲口“面授”，排除李白有意避讳或隐瞒的内容，“公示”出来的这些信息应该真实无疑。不然，就是李白要有意“撒谎”。范公之文为其亲自采访，“写作素材”来自李白之子伯禽的“手疏”记载和李白孙女的口述。较之前二者，文字信息更为翔实。核心内容与前二者所述一致。进一步明确了李白先祖系“凉武昭王”之“一房”这个

事实，流徙原因也与前二者所述基本相同。即，李白先祖流徙异域是被迫的，流徙的过程中“隐易姓名”，举家迁入蜀中，生活安定了，才养育了李白，也才恢复了原来的姓氏。范公之文虽然写于李白辞世以后，但他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他的写作态度亦非常小心慎重，完全是带着“求证”的目的去探询“真相”的。从写作的用语看，也极其认真、谨慎、缜密，毫无破绽。

稍后的唐人记述有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文中未提及李白的身世；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李白是“广汉人”，“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同样肯定了李白的蜀人身份；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言其“太白之精下降”，说他是太白金星下凡，是“谪仙人”，在此完成了对李白的“神化”，其他则别无交代。从这三人所记史料来看，均未对其身世作详尽介绍，或许认为前人的交代已经清楚明了而有意避免重复，或许所写之文的着眼点不同而无意忽略。再就是，在那个时代就存有不同看法，他们难以辨析是非真伪，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也难以定断，故未涉及李白的家世、身世等话题。

三、唐朝以后的人怎么说

唐以后，刘煦《旧唐书·文苑列传》、北宋宋祁《新唐书·文苑列传》、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都有过李白身世的相关记述，但似乎都难以服众。

明人胡应麟根据前人留下的有限史料，对李白的出生地进行了详细的考辨：

古今诗人出处，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以为山东者，《南部新书》也，《旧唐书传》也，元微之杜诗《序》也，晁氏《读书志》也；以为蜀郡人者，范传正《碑》也，《新唐书》也，刘全白《墓碣》也，魏颢、李阳冰、曾子固《太白集序》也，《唐诗纪事》也，《彰明逸事》也。然余考之魏颢序，言白本陇西，父家于绵，身既生蜀，继以授策于齐，育子于鲁云。阳冰序则言白本陇西成纪人，中叶非罪谪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遂指李树生伯阳，继亦言授策于齐紫极宫云云。《新书·传》则言白系武昭王孙，神龙初潜还广汉，遂为郡人，长客任城，与孔巢父等居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云云。曾子固序则言白蜀郡人，出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游梁最久，复入齐鲁云云。合诸说而定之，则《卮言》（按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谓白本陇西人，产于蜀，流寓山东，其说最完。而《纪事》末所谓或曰蜀、或曰齐、或曰陇，俱不为无据也。况白但生于蜀，一出后，未尝返其故居。陇西以其本宗，山东以其流寓，志白奚不宜哉！（《少室山房笔丛》卷九）

胡应麟“合诸说而定之”，得出如下结论：“所谓白本陇西人，产于蜀，流寓山东，其说最完。”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这个结论的得出，应该说有据有理，非常有说服力了。但是，争论并未就此终止，反而众说纷纭，愈说愈烈。尤其到了现当代，争论更甚，又不断有“新说”问世。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除了郭沫若的“碎叶说”还有“条支说”，即今天的阿富汗，当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焉耆碎叶说”，即今天的新疆；“长安说”，因李白自述有“本家金陵……”

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之说，“咸秦”即长安；“山东说”则是因李白曾有较长一段时间客居东鲁，故有此说。但是，这些也仅是说说而已，并未达成共识。

四、故乡江油的民间传说怎么说

前面李白的文史依据里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李白出生于蜀中江油——唐时的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县。后因避讳唐玄宗李隆基而将“昌隆”改为“昌明”。为了让大家更加信服这个结论，下面再从多个方面寻找依据对这个结论（事实）进一步补证。

李白生于江油，有影响深远的民间传说。如此，虽不足为据，但有悠久的历史、广泛的群众基础，可视着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江油，一直流传着“长庚入梦”这个传说。这个传说最初出现在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有“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之说。到了民间，就成了如下所述的通俗版本。

说是太白金星被玉皇大帝贬下凡间，他走出南天门向下一望，但见西蜀一地山水秀丽，竹木茂盛，阡陌纵横，土地肥美，宛如仙境。太白金星就决定在此投生凡间。这就是西蜀青莲乡——唐时剑南道绵州昌隆清廉。见一村妇在盘江河边洗纱，就摇身变成一条红色大鲤鱼，向江边游去，冲开纱线，跳进村妇的竹篮。这一片段，民间传说叫“红鲤入篮”。这洗纱得鱼之妇正是李客之妻。他们一家从西域迁来不久。两夫妇见鲤鱼自动跳入自家篮中，又惊又喜。这条自投罗网的红鲤当晚就变成了他们的一顿美餐。之后，这个浣纱女有了身孕。十月怀胎，浣纱女做了一个梦：天空金光闪亮，长庚星从天而降，恰巧落在她的怀中。再后来，李客的妻子就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夫妻非常高兴，认为，这小子既然是太白金星（长庚星）下凡入怀而生，就给他取名李白、字太白。

这个传说虽然神奇，剔除“神化”部分，故事的中心意思即是：李白生于蜀中江油，名与字的来历属于“神之所赐”。古时，大凡奇异之士，都有不凡的身世，李白也不例外。

这个传说还隐藏了一个“事实”。李客因儿子的降生，随即恢复了“李”姓，即“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伯阳”指老子李耳，此处代指李白，因为李姓人奉老子为祖先。范传正在其“碑记”中也有相似的记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天枝”即当朝帝室的支脉，也就是恢复原来的姓氏——“天枝”之姓。“告祥”即称祥，大家都认为这是祥瑞之事。之所以要取这样的名与字，与夫人“梦长庚”得子有关，与五行有关，“咸所取象”就是聚五行之精气而成像。总之，李白的降生，从各方面情况看，均呈祥瑞之象。意在突显李白身世非凡。意即，李白既有非凡的出生，就预示必有非凡的作为、非凡的人生。

可见，李白生于江油这一事实，民间传说与李阳冰留下的史料记述高度一致。同时，这个传说还载入了《彰明县志》《龙安府志》《江油县志》《四川总志》，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对曾经从诞生地唐时绵州昌隆、今日江油走出去的诗仙李白，既是纪念与缅怀，又是推崇与荣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传说最早出现在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里，那最初的起源就应该是来自李白。李白为何要为自己的出生“编撰”如此“传奇”？待考。是李白的本意，还是其父的主意，或者是李阳冰的“画蛇添足”，有意要“神化”李白？同样待考。

五、李白自己怎么说

李白生于江油，还能从他的诗文中找到印证材料。因诗歌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诗中的事情有虚有实，其文在叙述自己身世时又遮遮掩掩，都难以定性为“史料”，仅为我们提供了参考的线索，或某种推断的可能性而已。

唐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蜀中辗转，历时一年多，冲出蜀地万重群山的围困时，李白写下了《渡荆门送别》这首诗：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带着拜见李邕遭受冷遇的一股子闷气，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李白扬帆逐浪，冲出盆地，辞别巴山蜀水，“渡远荆门外”，眼前豁然开朗，天阔地迥，景色壮丽，气象万千。在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里，依然有着对故乡的依恋。诗人借船下的流水言说思乡情意。水流万里，船行万里，正可送他抵达梦想之地。

显然，这里的“故乡水”指的就是李白的家乡水，他也正是凭借从家门口流过的“故乡水”踏上追梦之旅的。流经他家门口的这条河叫涪江，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江油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非凡人生的起点站！流水不舍昼夜地为他送行，亦正可见他对故乡的难舍和依恋。

大约开元十六年（728），李白二十八岁，距他离开故乡踏上追梦之旅已近四年。此刻，他卧病淮南，慨叹时光流逝，功业无望，于是写了《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怀念师恩，难了乡情：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
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
良图俄弃损，衰疾乃绵剧。
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
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
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
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
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
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
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
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李白在家乡求学时，曾远涉临县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拜赵蕤为师，向他学习辅佐帝王之策和纵横之术，目的就是为他后来的追梦之旅储备知识，积蓄能量。赵蕤的儒家风范、道家思想、纵横风度和豪侠性格深刻地影响了李白。

李白出蜀后，辛苦辗转，追梦三年，结果是“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功业无成，时光飞逝，不免睹物思人——恩师在蜀，家思在蜀，乡路远阻，归而不得，于是赋诗自慰。

相对于故乡，他就是个“远行客”，恩师即为“故人”，而要抵达故乡故人则是“乡路远山隔”，遥不可及。李白将故人之思的源头明确地指向故乡——他的出生地、人生起点站。换言之，李白明确地把他的求学之地也同时视为故乡。在这首诗里，二者一体，绝无歧义。

李白还写过《荆门浮舟望蜀江》一诗，其中写道：“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一步一步回头，故乡春色依然，锦绣满目。而“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正是前路邈邈，前途未卜，因而惆怅满怀，乡思难已。

这个一生都信心满满、追梦不止的人，结果却非所愿。看这首大家熟知的《宣城见杜鹃花》：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东汉末年，蜀中设置了巴郡、巴东、巴西，合称三巴，后来泛指蜀地。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两个说法：一说写于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在宣城停留期间；一说写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之后，他流落江南，寄人篱下，又身染重病，晚景凄惨。不管哪种说法，距李白出蜀一晃过了三十余年，由青丝到白发，由青年到迟暮。物华流转，盛衰更易，一切都已经改变。

不管哪种情形，面对此景，都悲情难堪——他漂泊一生，功业未竟，又老之将至。此刻，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瞬间点燃了他的思乡烈焰。情纵万里，思越千山，他即刻想到了蜀国，想到了三巴，想到了多年前曾听过的子规鸟熟悉的叫声。

感物起兴，乡思难遏，覆水难收。他心里所忆、笔下所述、诗中所写的故乡难道不是生他养他的故乡？胡马依北，越鸟巢南，狐死首丘，落叶归根，正是吾国吾族吾民千古以来之常情！

杜鹃遍野，烈焰满山，乡思泛滥，愁肠欲断。蜀中子规，一声声，一遍遍，似在一刻不停地唤他归去。而“三巴”之一的“巴西郡”正是诗人的故乡所在地。“三巴”则是广义的大区域，即蜀中就是他“忆”及的故乡。

试想，若蜀中昌隆（今四川省江油市）仅是李白或者他的家族迁徙途中的一个驿站，他又何至于会这般肝肠寸断？

他最终也没有回到人生的起点站——蜀中西北的昌隆清廉（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这正是他的悲情的难堪之处，也是人们对他终老不还乡的不解之处——是功业未成无颜见家乡父老，还是早就知晓其家人已从蜀中再次举家秘密迁徙？若是出于这两个原因或其中一点，就不难理解他流放夜郎遇赦后为什么不顺势回乡归根的原因了。要知道，在白帝城遇赦，故乡在望，归路咫尺，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顺流放舟，“千里江陵一日还”！不是“还”乡，而是再次赶赴更远的地方！是“还”归漂泊之途，“还”归自由之态，“还”归他继续追梦的路上。

李白还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说：“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汉时，绵州为广汉郡所辖。到唐代，岷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地带谓之“江汉”。“少长江汉”即说他从小就生活在两江之间的广阔地带。在这篇文章中，李白还称司马相如为“乡人”：“见乡人相如大夸云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他说，因为司马相如是其同乡，见他著文盛赞云梦大泽，所以特意赶来观看。这就等于说他自己也肯定了蜀中江汉是他的故乡。

李白还在其诗中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说自己的家就在蜀中昌隆的紫云山下，那里道风盛行。正源于此，李白对道的追求终生都未停止，而且融入其精气神，成为独绝古今的诗界仙家！

李白漂泊一生，他对故乡的思念一刻也未停止，竟写了三十多首诗怀念家乡，愈是年迈愈是强烈。蜀中江油若非他的血脉源头，生养之地，岂会如此？

六、杜甫怎么说

李白生于江油还得到了杜甫的诗歌印证。

李白“赐金放还”来到洛阳，与杜甫相遇，到汴州，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即今天的洛阳、商丘一带。三人惺惺相惜，诗酒唱和，留下了千古佳话。李白回忆这段日子称：“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这段游历对年轻才俊杜甫来讲，尤其幸运，这段友谊丰富了他的人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高适最实惠，这之前，他基本上还徘徊在诗国的大门之外，受双子星影响，他的诗名很快跻身大唐一流水平，官场尤其幸运，竟然还封了侯，有了自家的私人地盘。

“李杜相会”被誉为中国文坛几千年一遇的盛事，连后来的苏轼都不无羡慕地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而相遇之时，两人都特倒霉。李白就不说了，小十一岁的杜甫在十年前进京赶考不第，一直都在郁闷中漫无目的地寻找机会。对李白来讲，与杜甫相会，多了一位助其消愁解闷的酒友，起兴了，还可以诗酒唱和，倒是惬意。对老杜来讲，可谓幸事。李白不仅比自己年长，诗名酒名早已是超级巨星。杜甫十分看重他们的友谊，两次与李白同游，肯定会问及李白的家世。

杜甫前后写了十首诗专门怀念李白，另有五首提到李白，《不见》是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诗题下自注说，“近无李白消息”，大约作于上元二年（761年），杜甫流落蜀中，很可能就在距李白故乡昌隆最近的梓州。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自己仰慕的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就近在咫尺，但是，战火纷飞，困窘中的杜甫却不能及。他北望匡山——李白青少年时求学习剑之地，为其命运担忧，禁不住发出了深情而热切地呼唤：“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希望他叶落归根，老返故里——再次印证了炎黄传统，同样印证了昌隆是李白的家乡——今四川江油是李白的出生地！

可惜的是，当年老杜在梓州虽逗留一年有余，但兵荒马乱，生活窘迫，无暇自顾的杜甫竟无缘到李白故里一游，后人也多有遗憾。

从以上众多依据的多方“印证”来看，李白生于蜀中昌隆（今四川江油）别无异议。之所以存在众多说法，明代学者李贽对此早就有过精辟的总结：“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一语中的，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 李白“胡人”辨

一、李白出生“碎叶说”

李白为后世留下了近千件传世诗文，却没有留下一段亲自撰写的、比较清晰确切的、专门介绍其身世的“自我简介”。他在一些诗文中谈及此事时还闪烁其词，甚至自相矛盾。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场合，出现不同的说法。与之同时代的相关记录也不够清晰。多种因素，加重了李白的身世迷雾。李白辞世后，他的家世就更是迷雾重重。虽有魏颢、李阳冰、范传正的证据在，仍难征服后人，仍难拨开迷雾显出真容。

这不是说李白本人表述不清，上述三人的记述有问题，而是缺乏必要的事实链接和史料支撑。加之地名随朝代的更替而变化、年代的久远、史料本就有限等因素，导致人们认知上的差异。因而产生不同的质疑，得出不同的结论。

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在《赠张相镐二首》其二里又说：“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都明确了其祖籍“陇西”，即今天的甘肃南部渭水流域的陇西盆地。“先世为边将”暗示自己是远祖李广之后。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有人考证“金陵”是西凉“建康郡”，今甘肃兰州一带。祖上因“沮渠蒙逊之难”而“奔流”迁徙。这里有一个历史衔接点，即“沮渠蒙逊之难”，说的是凉武昭王之后的毁灭。凉武昭王的先祖就是汉将李广。如此，李白的身世脉络就比较清晰了。但是，有人对“金陵”所在地提出了质疑，认为“金陵”是东晋建康的别称，亦即现在的南京。如此一来，就差之天远地远了。也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西安，即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带。

这些都来自李白的自述，但均看不出李白是胡人之后。

二、李白身世与“胡人说”

于是，关于李白身世就有了众多说法，其中“胡人说”曾大行其道。

李白“胡人说”的提出者是陈寅恪，他曾这样断定：“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本为胡人，绝无疑义矣。”若当时的“西突厥”系大唐所辖，汉人“谪居”于此有何不可呢？

查阅有关李白外貌描写的记录，有出自李白的“粉丝”魏颢笔下的“眸子炯然，哆如饿

虎”(《李翰林集序》)八个字,言其目光炯炯,犹如饿虎,面带凶相。另有好友崔宗之赞其“双眸光照人”(崔宗之《赠李十二白》)互为印证。其他再无面部描写。有研究者据魏颢的描写就此推断李白是胡人。此结论明显证据乏力,挥舞着武断的刀斧,强加于人。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读了魏颢这八个字,有人读出的李白是英俊,有人读出的是英雄,有人读出的是莽汉,还有人读出的是胡人,甚至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而从李白的穿着来看,则是“或时束带,风流酝藉”,风度翩翩,风流倜傥,哪有胡人外观蛮相、粗鲁暴烈的影子?这样人云亦云,以致李白是胡人之说有了较广泛的贩卖市场。

有一点首先要达成共识,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个汉人以外的什么人的可能性太小,甚至说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精通汉文化,深谙诸子百家等经典著述,他才能以“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这样深厚汉文化造诣的“文化人”或“隐士”身份出现在世人眼里,他才能直接指导李白学习汉人的经典诗文,指导李白从小立志,以便长大后可以顺利地完“事国荣亲”的家族使命。再则,李白的理想是“事国荣亲”,这也就直接否定了他的胡人身份。若是胡人,他何苦要经历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蜀地隐居,再寻找机会“事国荣亲”呢?要不就在胡地打天下,要不就直奔长安得了。何至于要这般地煞费苦心、历尽周折呢?

李白在回忆自己蜀中生活的文章中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司马相如),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嵩游庐山序》)有了父亲的启蒙,他才可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他才可能小小年纪就树立了“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二首》其一)的远大理想,并为之不懈地奋斗,甚至以不惜牺牲个人尊严为代价地不懈抗争。注意,一句“百代期荣亲”就道破了李白为从政理想百折不回、至死不渝的全部秘密——这也是李氏家族的最大愿望,是李白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和奋斗动力。

因此,如果李白的父亲是胡人,他能做到这些吗?他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一个“高卧云林,不求禄仕”的隐者,为什么偏偏要让自己的儿子去跑江湖、闯世界、“报主”而“荣亲”呢?这中间必有隐情。隐情的核心就在于,李白的父亲肯定不是胡人。如果李白的父亲是胡人,他就该老老实实地待在西域,才是其最现实的选择。若是胡人,他肯定犯不着大老远跑到中原来“事国荣亲”,完成所谓的报效国家、振兴家族的使命。若其父是胡人,碎叶又是大唐版图所辖,他就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直入长安——因为他是大唐的子民,享有这样的权利。再进一步推测,李白的父亲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而且他本人或者其家族在不太遥远的年代还有过辉煌的过往,也曾非常的阔绰,非一般粗俗草民,其历史的真相被李白及其前辈深深地埋在心底,秘不示人。

三、唐朝人怎么说

既然他的父亲李客是胡人的可能性已经排除,那李白的最大可能性就是“混血儿”,即他的母亲不是汉人,他本人是一个有一半汉人血统的胡人后裔(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就直接简称“胡人”)。这种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原因在于:

其一,若李白是胡人,他的家族就不会因“放行”“非罪”而“潜还”或“逃归”于蜀了。

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

——魏 颢《李翰林集序》

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李阳冰《草堂集序》

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还”“归”二字首先否定了李白的祖上是汉人以外的什么人，其先辈肯定经历了由内地而西域再至蜀中这样一个往返迁徙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的真伪、原因，此处暂且不论，也暂无史料。就此情形而言，李白本人是胡人的可能性非常小。

有人说，李白的父亲在流居西域时可能与胡人通婚。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一则，李家既然是“放行”“非罪”于西域（假设这个原因真实），是“戴罪”之身，身份特殊，背景复杂，很难取信于胡人，更别说通婚了。二则，李家如果真的是“凉武昭王”之后，其家族观念森严，也不太可能与外族好通婚。

其二，若李白是胡人，母亲必是胡人。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家庭突然出现在蜀地，而且还大张旗鼓地置舍买地，长期定居，同样是一件难事。一是一大家人来路不明，当地人难以接受这样的家庭。二是李家距当地的官府昌隆县衙不远，仅一河之隔，自然逃不过官府的盘查。如遇官府盘查，李家既无谱牒，也难以自圆其说，更难以立足安身，就别说要长期居住在这里。再说，李家既是“潜还”“逃归”于蜀，更要自觉斩断麻烦，远避纠纷，消除祸端，这才是明智之举。

范传正说：“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个不染世俗的高雅之士，有道家风范，隐者气质。但这个“逋”字又颇有深意，有“逃亡”之意。这样一个有较深厚学养修为的人，对婚姻必然有自己的要求，会更加慎重。当然，这一点都出自李白自己和他的后人之后，并无旁证，也极有可能是为掩人耳目，李客所做的伪装也未可知。

其三，若李白是胡人，他在蜀中求学亦必受到更多的阻碍。假定李白出生西域，李白的汉语学习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若真是五岁入蜀，才启蒙学汉语读汉文的话，他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读懂汉语著作，更不用说写汉语诗了。再说，五岁之前这一大段时间，他肯定与其家人一道奔走在漫长的迁徙途中，而且还要躲避官府或者仇家的视线。他是无暇学说汉语、学写汉诗汉文的。而事实是，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除去其中的夸张成分，就是勉为其难的读一点汉语典籍，写一点简单的诗文，能做到这样，也非易事。更何况，李白在蜀中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还“挺三蜀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如果李白是一个胡人，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并超越常人地运用汉语写作，那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再则，李白能在蜀地毫无阻碍地与人交流亦可推测他不是胡人，或者混血儿。一般来讲，对于外来的陌生人，人们会本能地自我戒备，远远避之。何况，李白还是个相貌、来历都有些“殊异”的人，人们往往很难与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正常交往，更不可能出现赵蕤授之以纵

横、王道之术的事情。即使李白苦苦求学，赵蕤自然也要回避——他是否愿意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将来去辅佐君主呢？因为这个被他帮助过的人很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动摇李唐江山。专门研究王道之术、中国传统文化修为颇深、智商特高的赵蕤肯定会想到这一点。

当李白将他的诗文递交给当时著名文学家、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时，苏颋欣然受之，认真阅读后评价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这是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说的话，压缩一些夸张的水分，也有其可信之处。苏颋的评价透出两条信息：其一是苏颋不仅很快接受了李白这个人，同时还接受了李白的诗文和才气，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尽管这个评价带有鼓励性质，读李白蜀中篇什，也可看出苏颋的评价并无太多的夸张成分；其二，从苏颋鼓励李白如果“广之以学”，就能与司马相如比肩来看，苏大人对青年李白给予了一定的厚望，使得李白更加坚定了报国图志、“事国荣亲”的理想。

司马相如是蜀中的文化楷模，正是因为他在汉赋上的卓越贡献，才被召入朝廷而委以重任的。李白也一直以这个蜀中前辈为偶像，在很多诗文中表露心迹。苏颋的言下之意是，好好努力，你李白就有成为司马相如第二的可能。苏颋也不会糊涂到希望这样一个貌似蛮夷、来路不明的人将来成为重权在握的朝廷要臣。他们由此还结成了师友之交，李白在以后的诗文中还常常念叨，并诉诸笔端，作为炫耀才华的资本。

李白十分看重与苏大人的路遇投刺。因为苏颋的评价是一支兴奋剂、强心针，更坚定了李白“事国荣亲”的决心，也成了他以后自我推销、频频使用的最佳广告词。

李白在蜀中时，还曾“隐于岷山之阳”“养高忘机，不屈之迹”，喂养奇禽珍鸟相伴。其声名传到广汉太守那里，太守竟要举荐他，被李白拒绝了。李白拒绝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李白当时可能以为自己的实力还没有达到能被直接举荐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李白认为广汉太守的分量不够，难以完成直接向皇帝举荐人才这样的大事，弄不好，花大量的精力不说，还要荒废时日，对以后的举荐不利。

从以上这些信息和推理看，李白是胡人或者混血儿的可能性都很小。

其四，从李白两次正式婚姻来看，李白是胡人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不管是许家还是宗家，他们的爷爷辈都曾做过唐朝的宰相之职，虽然家道破落，也不至于要把名门之后嫁给一个“长相怪异”、来路不明、穷困潦倒的“蛮夷”之人。

其五，唐玄宗再开明，也难以接受李白这样一个混血儿旁若无人地出入宫廷翰林，尽管唐朝允许外国人参加科考，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政权统治的核心。

据记载，唐朝通过科考接受外国人或者异族做官较有名的是崔致远。从时间上看，这时李白已辞世一百余年。公元874年，崔致远金榜题名，消息传到他的国家新罗（朝鲜半岛），举族同庆。两年后，弱冠之年的他被朝廷任命为溧水县尉，任期三年。任职期间，崔致远官闲禄厚，以文会友，看上去他既无高远的政治追求，也没多大的政绩。

恰好，李白应诏入朝的这一段经历，是大唐盛世，影响极大，见证人多，记录者众，史料较为翔实。从这些记录看，也难以找到有关李白是胡人或混血儿的记录。安禄山的来龙去脉倒是记录得非常清楚，其劣迹流传久远而不衰。

四、李白自己怎么说

李白是胡人或者混血儿，是后人仅凭李白的忠实“粉丝”魏颢“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八个字的描述来判断的，材料不充分，证据不足，难以服人。何况文字的张力使读者见仁见智，每一个人读了这八个字后都会在自己的心里描画出不同的李白来。

试想，如果李白是胡人，以他的“特异”之貌行走在大唐盛世，行走在大唐的奇山丽水，行走在盛唐的长安，行走在盛唐的高堂庙宇，行走在权门相府，那会是怎样的一幅画图。难道所有见过李白的人都熟视无睹？所有见过李白的人都集体失语？

如果说李白是胡人，其根在西域，何必要孤零零远涉千里迁往内地？再说，李白既是胡人，何不直奔长安，直接做个“外国友人”？如此，还可能受到隆重的礼遇，还可光明正大地参加科举考试。李白既是胡人，就不该有所顾忌，就不该打着唐朝皇室血统的旗帜而明目张胆地大肆宣扬自己，他的外貌特征就可直接揭穿其谎言。李白既是胡人，就不可能以“外族”的形貌特征而奢望混入李唐王朝的权力高层，甚至跟皇室攀亲，而痴迷地妄想为帝王师，并且还将此梦想痴迷地坚守了一生。再说，如果李白是胡人，他哪来的底气，要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地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职呢？

在李白的诗文中，除了他对西域女子的热辣、妖媚有兴趣外，从未见他思念西域，向往西域。有道是，多次要“斩楼兰”“静胡沙”，要出征边关，希望在那里立战功，建奇勋，解世纷。李白写过一首《胡无人》：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嫫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胡无人，汉道昌。
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是李白借乐府旧题写的一首古体诗。诗中，他以汉代唐，写了“汉家战士三十万”一次出征胡兵的激烈战况。前六句说胡汉两方兵强马壮，看上去势均力敌，暗示将有一场恶战在即；接下来四句以龙虎交战为喻，言战事激烈；余下言志，希望汉军大败胡兵，愿望强烈，气势豪迈，慷慨不凡。至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尚无定论。不管写于何时何地何境，诗言志，写的都是李白的心声。

李白在《子夜吴歌》中说：“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在《送族弟绾从军安西》中说：“君王按剑望边色，旄头已落胡天空。”他还在《战城南》《关山月》《永王东巡歌》等诗中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愿——要将胡人赶尽杀绝，以保大唐江山金瓯永固，平民百姓幸福安康。

郭沫若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武断地肯定李白生于碎叶，却又极力批判胡人说。他的观点

是明确的：既维护领土主权，又维护先辈人权，是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所以，胡人说仅只能看着一种假设，仅说说而已，不可当真。再则，李唐王朝是否能欣然接纳一个异族进入其权力高层、统治核心，并让其放肆地指手画脚、自由地出入宫廷庙堂吗？

李白祖上的真实姓氏和获罪原由一直秘不外宣，这恰好证实了其祖上获罪与李唐皇族有着某种无法割断的联系。恰是这隐秘不宣的关系，危及李白前辈及其整个家族的保全与血脉的延续。即便是结有难了的世仇，除开李唐王朝，一百多年的岁月风蚀，也早该淡而化之了。即便心有余悸，也不至于死埋心底而秘不示人。否则，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身世之谜大白于天下，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行走于世。他的内心，或许就没有那么多难以消释的怨愤，就没有那么多难以化解的愁怨了。

李白家族的振兴计划

一、李白家族的“荣亲”计划

李白在其诗《赠张相镐二首》其一中写道：“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李白此说，绝非一时诗兴所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值得注意。此诗作于他上错李璘战船、第二次从政受挫之后，诗中所言当是其心底话，是他苦斗一生从未放弃的真实且直接的原因。

“百代期荣亲”，一语道破了他的家族使命，这是支撑李白奋斗一生、抗争一生的最坚实的精神支柱。“报主”是他为了实现“荣亲”之志做出的不二选择。因此，他不惜“一生”相倾，苦苦追寻。从这两句诗里，还隐隐约约看出，李白的祖上确实非寻常人家，具体的信息属于家族秘史，只有李白及其祖上知晓，绝不外道。与此诗句内容相近的李白自述，最早出现在727年他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白将寿山人格化，以“寿山之口”戏答了他的朋友孟少府对他的指责，言其怀才不遇和高远理想。在表述完高远理想后，他说道：“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其中的“事君”“荣亲”之句与诗的表述何其相似。更重要的是，李白将“事君”之事认定为人生之大“道”，“荣亲”之事看着此生之要“义”。这“道”“义”二字就是他对其“功成身退”高远理想的具象而形象的阐释。

可见，几十年的奋斗，李白遭受了人生的多次失败，写《赠张相镐二首》诗，意在再次申明自己的高远理想，希望能得到世人的了解和他人的助力。

二、李白与“荣亲”计划

暂且认定李白的祖上遭遇厄运是事情的真相，那么，振兴家族就成了一代代后辈们不得不扛起的家族使命。因为李白的前辈已经“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了。振兴家族就成了李家后人改变现状的当务之急。

为了将这个愿望转化为现实，接受前辈的家庭教化，就成了每个李家男儿从小即始的必修课。一代不行，还有下一代，如此代代相传。这也是李白的父亲李客以高士而深居的原因。李客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教育李白的重任。眉州今人刘小川也有此看法：“家族的意志，经由父亲的悉心培养，传入他的血脉。包括那些从小就伴随他的、影影绰绰的家族传说。父亲设计他、铸就他，然后静悄悄死去。”（《品李白》）

就这样，李客毫不懈怠地对李白施加影响，在其灵魂深处打上永久的烙印。幼年、少年、青年，反复地向李白灌输一个思想：振兴家族、光耀门楣的重任就是李白存在的理由、活着的要义。在李白的灵魂日志的封面，先前空洞的理想被写上了赫然夺目的两个字——“荣亲”。李白一冲动，就在自己的诗中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二首》其一）这是他直到晚年入李璘幕受挫之后才黯然写下的诗句，理想多次受挫，内心极其无奈，当是肺腑之言的直白陈述。而“荣亲”的唯一途径就是“报主”（李白在其他地方亦表示为“事国”），就是居高位而谋国是，平乱象而安天下，献睿智而建奇勋。

“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这是李白的从叔李阳冰给出的最有力的旁证。这应该是李白生命中除开父母以外的最可信赖的人，是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最后依靠。他拜托李阳冰为自己编辑诗集并作序。李白此刻对李阳冰所说当无虚言。

李白在这里说得明白极了，“报主”是前提，是手段；“荣亲”是目的，是终极。这是李家日积月累的“理想教育”的成果，也是李白百折不回地拼搏一生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李白为此发奋读书，砥砺能力。他读破古今典籍诗文，又旁涉杂家异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知识储备。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进行能力储备——研习古代明贤，萃取成功之道；遍访名师名士，寻求治国之策；苦练剑术，文武兼备；学道求仙，博取声名，构筑精神栖所，历练高士风骨。在李白的践志线路图上，疾走的李白一手妙笔生花，写得锦绣华章；一手剑气如虹，练就奇绝剑法。文武兼备，足以让他游刃有余地应对追梦途中的种种困厄。文武并行，互为补充，以确保目标的达成。

李白一路走来，高吟着“安社稷”“济苍生”的济世理想，高调入世。男儿走天下，仗剑闯世界，是自古英雄不得不割舍亲情的武断、主观理由。为此，李白要寻找辅助之能，求仙学道成了李白的不二选择。一则轻松浪漫，履痕处处都是绝好风景，正对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期愿。二则个中有真意，只赐有缘人，只有李白能够读懂好山好水的深邃与灵魂。三则遭罪受挫，不免心劳神疲，可以视之为最佳的精神栖所，待养足精神，又可收拾行头继续远征。

这样的人生才是别样的人生，精彩的人生，具挑战性的人生。游历险绝，人生艰危，阅遍事态万象，尝尽人间百味，从政追求从未停止，李白最终换来的是“中夭折翅”，不是“力不济”，而是机会来临却毫无施政准备（其实，唐玄宗也并未给他真正的机会）。他狂傲不群，又无为官之道。低眉折腰不是他的真性情，仰人鼻息不是他的真骨气。他既不见风使舵的为官奴性，又无及时化解矛盾、驾驭不测时局的应变能力，于是，李白不可能自我构建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仕场”环境，从政的失败是李白无法避免又不愿接受的悲情结局。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政之花残酷凋零，凋零成李白个人奋斗途中的纷

扬浮尘，凋零成李白人生旅途的绮瑰风景。诗歌，是李白践志征程的在案记录，是李白心路历程的文本写真。可谓巨树列阵，华荫满途，硕果满枝。

时间的砺石磨钝了多少锋芒利器，岁月的柔波销蚀了多少沉沙折戟。李白的名字愈磨愈亮，李白的诗歌万古长青，李白的人文精神更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未走上仕途是理想之花的残酷摧折，并不意味着生命之光就一定会暗淡晦涩。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歌词）这是现代人的豪情付出。千年前的李白听了，或许会展眉一笑。虽然有些苦涩和无奈，一味地付出毕竟没有辜负用心笃定的人。“说到不如做到”，结果却不一定就是你所期待的那般美好，那样圆满，更别说最好。世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事与愿违的事天天都在上演，只是被李白演得分外悲情。

实际上，李客身上同样具备李白所具备的智能，只是缺乏一个可以出场、敢于出场呈现的机会。唐朝步入繁盛，为李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出场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李白成了李家振兴门楣的最佳人选，李家人期望依靠李白的单打独斗而行走江湖，阔步庙堂，依靠他天赐的诗才去完成整个家族的复兴使命。

因而，李白的悲情演绎、才情爆发就有了实现的依据和基础，其情如山洪决地，其诗如黄河奔腾，才找到了足够的理由，获取了充分的能量，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李白选择的入世方式也证明了人们对其身世之疑——绝非胡人。

如果李白的根在西域，他家为何要孤零零地迁入内地这个远乡僻壤。李白如果确属胡人，何不直奔长安，直接做个“异族友人”？从这个角度看，李白的家世一定有“难言之隐”，有家族濒危之忧，他个人只身行走江湖、追求功名也一定有生死存亡之险。

李白敢以“戴罪”之身走向大唐，并通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成功“塑造”这一非凡的“文史文化形象”，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家族的使命、天才的胆识。

可见，自我的选择，时代的催迫，是成就“志士李白”这一“文史文化形象”的关键。

三、“荣亲”与“报主”的结合

将家族的“荣亲”计划与“报主”相结合，这是李白的智慧选择。

李白以其天才的身份狂傲地行走于李唐王朝，实是一着险棋。他既想隐瞒身世，又想凭借其诗才而振兴家族，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心“痼疾”不得不处处时时牵制其言行的任性发挥。所以，李白之狂其实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虽费尽了心智，却不可能还原本色，坦露本真，敞明心迹。所以，李白之狂还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

李白保全自己的最佳“护身符”就是报国，就是“济天下”。这个“护身符”一旦未达到李白的预期效果，他就只得选择放弃，再把自己放归江湖，云游万里。庙堂之梦再崇高辉煌，也只得暂时放置。壮山丽水，尽可率性而游。江湖有酒，倒可以任由一醉。这样一来，虽不及身围朝廷的锦衣玉食，满身光环，至少，挣脱了“囚笼”，砸碎了“镣铐”，可以逍遥任性地行走江湖，无所顾忌地享受自由，挥霍激情，以“诗酒”这两味特效药来治疗自己满身心的伤疤。

一切的付出与挫折均源于家族使命。

李白青少年时代勤奋学习，其“铁杵成针”的启智故事家喻户晓，随后的习武练剑、求师访道等所作所为，动力源泉均出于此。

无论是魏颢说的“放形”，李阳冰的“非罪谪居”，还是范传正所说的“被窜”，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一个事实：李白祖上流寓西域，是情非所愿，是被迫远迁。

正因为他的家族曾经遭遇这样的非难和厄运，致使原本兴旺的家族瞬间沉沦、凋敝。若无西域之迁这条退路，甚至有家族绝灭的危险。这次非难使得李白祖上“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正因为此，重振家势、再光门楣就成了这个家族的最大愿望。这就是李白在诗文中所说的“百代期荣亲”，或“荣亲之义”。而完成“荣亲”之策的最佳途径就是“事国”，正如李白所说“一生欲报主”，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点。再明白一点，就是入仕，就是要当一人之下的最大高官，就是要旗帜鲜明地为“帝王师”，以求得安社稷，济苍生，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最后抵达“荣亲”这一终极目的。

李白把这个伟大的目标化为不竭的动力，百折不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自觉羽翼丰满，二十四岁那年，李白以一首《别匡山》作别了养育他的故土亲人。此刻，亲情在身后，是割不去的羁绊，而家族使命又驱使着他不得不离开，不得不砥砺前行。他要以极大的耐力挣脱羁绊，又要以莫大的胆识去迎接未知世界的严峻挑战。这时，离别，是李白唯一的选择。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当他作别亲人时，犹如大唐一场别开生面的加冕礼，有壮怀激烈的誓言，也有别家辞亲、孤身漂泊的伤感。家族使命让诗人无法在诗歌中酣畅地表达思念之情。“荣亲”是他背负一生的重任，“事国”成了改变家世厄运的唯一“捷径”，为此，还让他悖逆了“落叶归根”的传统。

李白是一个诗人，一个天才诗人，一个不可复制的诗人。可是，李白从一开始就没有设定要成为诗人的目标，更不愿做一个职业诗人。即使他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复振“大雅之声”，要“垂辉映千春”（《古风》其一），骨子里的首选却非于此。

李白最初、最后、最根本且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做一个政治家，一个大政治家，一个能为“帝王师”“安社稷”“济苍生”的杰出政治家，一个足可青史留名的贤者。然而，天不遂人。李白从政失败，家族振兴计划没有完成，却有了诗歌这个副产品——成就了他不朽的诗歌创作的同时，还成就了他伟大的精神贡献。

